



評論

「一國兩制」下港澳五年規劃的體系意義

議事論事
陸文英

日前在深圳舉行的「一國兩制」學術研討會上，逾百位與會專家學者就五年規劃與提升港澳核心競爭力、發揮優勢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等議題展開深入研討。筆者願就自身的思考和理解，就港澳五年規劃對於促進「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意義，談幾點看法。

一、治理思維的深層轉型：從「積極不干預」到「主動有為」的發展必然

港澳過去長期奉行「小政府、大市場」的自由市場理念，實施「積極不干預」治理模式，在特定歷史階段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隨着全球產業鏈重組、區域競爭加劇，這種依賴市場自發調節的治理思維，逐漸暴露出明顯的局限性。

在香港「行政主導」的新形勢之下，五年規劃更成為特區政府重塑治理互動關係的核心抓手。過去香港的施政體系中，部門之間長期存在各自為政的「部門主義」，重大政策往往在不同機構的協調中消耗大量時間，難以形成合力。如今透過五年規劃的頂層統領，管治意志得以轉化為全政府層面的共同行動綱領，發展目標拆解到每個決策局的年度KPI，跨部門項目建立專屬協調機制。

五年規劃的出台，正是對以前舊制

治理困境的系統性回應。它打破了「是否擁有中長期規劃是區分社會制度標準」的刻板印象，用「高效市場＋有為政府」的組合邏輯，完成了治理哲學的關鍵升級。這種轉變是在充分保留自由市場核心優勢的基礎上，讓政府從被動的執行者轉型為主動的戰略構建者，通過頂層設計為產業發展錨定方向，為土地整備劃定周期，為跨區域合作打通堵點，最終形成「市場活力充分釋放、政府戰略精準補位」的良性循環。五年規劃的核心角色正是以國家策略導向對沖市場自發性盲目性，它透過「目標確定＋動態調適」把長期現代化目標拆成可落地的階段任務，避免發展只關注短期利潤的隨意性，站得更高、看得更遠，用清晰目標引導公共資源方向，以穩定性對沖外部不確定性。

這種治理模式的迭代，既是對港澳自身發展經驗的反思，也豐富了全球治理理論——正如與會的一位國際學者所言，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找到動態平衡，本身就是所有現代經濟體實現長期繁榮的關鍵秘鑰。

二、角色躍遷的本質升級：從「借力發展」到「雙向賦能」的格局重塑

過去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本質上是分享國家發展紅利的受益者。而五年規劃與國家「十五五」規劃的全面對

接，重構了香港與國家發展的關係邏輯：它不再是單向借力，而是雙向賦能。

這種角色轉變有着清晰的實踐落點。香港不再只是內地連接全球的「超級聯繫人」，更升級為「超級增值人」和「超級合夥人」。依託北部都會區戰略布局，香港的國際金融、專業服務優勢，將與大灣區的先進製造、科創轉化能力深度耦合，不僅能培育出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新質生產力賽道，更能支持內地企業「併船出海」，共同參與全球高標準市場競爭，為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獨特支撐。

這種角色躍遷，讓「國家所需」與「港澳所長」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精準匹配，也讓港澳的獨特制度優勢，真正轉化為國家發展大局中不可取代的價值。

三、打破治理路徑依賴：從「被動守成」到「主動布局」的施政思維轉變

五年規劃的推出，正是港澳特區政府主動打破治理路徑依賴的關鍵一步。它並非要顛覆行之多年的市場經濟與普通法體系，而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內，為施政補上「中長期戰略引領」的維度：把過去零散的年度施政報告目標，梳理成覆蓋五年的連續性行動綱領，讓政策不會隨着行政長官任期輪換出現斷層。這場施政思維的轉變，既強化了特

區的「一國」性內涵，也沒有觸碰任何「兩制」的核心底線，卻實實在在解決了港澳過去多年想突破卻難以突破的治理桎梏。

四、重新定義雙向關係：從「搭乘順風車」到「共建新優勢」的大灣區協同升級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社會大眾對港澳與內地合作的認知，大多停留在「港澳發揮聯通世界的優勢，分享內地經濟高速成長紅利」的單向邏輯。但五年規劃全面對接「十五五」規劃，徹底翻轉了這個傳統認知，重新定義了港澳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角色定位。

現今的港澳，不再只是國家發展的「旁觀者」與「受益者」，而是深度參與共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協作者：香港透過北部都會區的規劃落地，把超過300平方公里的臨深圳土地，從過去的邊緣鄉郊地帶，升級成連接香港國際創資本、大灣區先進製造基地的核心樞紐。這不僅能解決香港長期的土地不足問題，也能讓香港的金融、專業服務優勢，直接對接大灣區的產業落地能力，打造出全球獨一無二的「國際資本＋先進製造」產業鏈。

這種協同模式，不再是單方面借力內地，而是港澳與內地互相輸出獨特優勢，共同在全球產業競爭中打造出別的

區域無法複製的核心競爭力。

五、豐富「一國兩制」內涵：從「制度並存」到「效能疊加」的長期制度探索

回歸近三十年，「一國兩制」的實踐已經走過了「確保制度不變」的基礎階段，如今港澳五年規劃的落地，正是要開啟「釋放兩制獨特優勢」的全新階段。這項規劃最核心的價值，從來不是規劃裏的經濟成長數字，而是它探索出了一套在「一國兩制」體系之下，實現長期穩定協同、互利共榮的可行路徑。

它用「規劃對接」這個溫和且務實的工具，把過去兩地不同體系之間容易出現的政策錯位、規則衝突，轉化為有時間表、有協調機制的務實互動互利合作。這種模式不僅能支撐港澳未來的長期繁榮，更為全球不同制度的區域如何開展深度合作，提供了來自中國的全新治理模板。

站在「一國兩制」新階段的起點回望，這次深圳研討會釋放的信號十分清晰：港澳的未來必然不是在「維持現狀」和「全盤同化」之間做二元選擇，而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走出一條既保留自身獨特優勢，又深度融入整體國家發展大局的全新道路。而五年規劃，正是這條路上第一塊至關重要的鋪路石。

AI 重塑職場 從生產力紅利到就業紅利



林順潮

港事港心

10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適應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助力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的意見》，強調堅持就業優先，促進技術進步、產業升級與就業促進、民生改善相協調。香港「一五規劃」亦提出全面推進「人工智能＋」，採取「AI產業化、產業AI化」的發展路向，並加強技能培訓和就業支援。

人工智能正加速走進各行各業，社會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AI會否「搶飯碗」。回顧歷次工業革命，從蒸汽機、電力到自動化和資訊科技，重大技術突破往往會重塑生產方式和就業結構：部分工作被替代，部分職位被重新定義，同時催生新的產業、職業和技能需求。今天的AI浪潮亦正在帶來類似變化，其影響不只是職位增減，更涉及工作內容、技能要求和人力配置的重新組合。筆者認為，要看清AI對就業的影響，既要看總量，也要看結構，更要看到不同群體承受的轉型壓力。香港如何在已有部署基礎上進一步打通供需兩端，將決定生產力提升能否更充分轉化為就業紅利。

總量：替代與創造並存

美國經濟學會刊載的一項研究指出，自動化讓技術接手原本由勞工完成的部分工作任務，會產生「替代效應」，降低相關勞動需求；另一方面，新技術亦會創造新的工作任務和分工，

形成「創造效應」。

這一點在AI時代尤其明顯。資料整理、文書處理等重複性較高、流程較標準化的工作，更容易由AI協助甚至部分取代；需要複雜判斷、人際互動和專業責任的工作，則仍較依賴人。醫療就是一個例子，AI可以協助醫學影像分析和資料整合，提高工作效率，但臨床判斷、醫患溝通和人文關懷仍高度依賴人的專業能力。

與此同時，AI亦在產生新的就業創造力量。香港最新人力推算亦指出，市場對具備AI應用和跨領域能力的「複合型人才」需求增加。未來需要的未必只是AI工程師，也包括「AI＋金融」、「AI＋醫療」、「AI＋物流」、「AI＋專業服務」等不同類型的人才。

香港「一五規劃」亦着力拓展AI應用，提出全面推進「人工智能＋」，推動AI與不同行業深度融合，並透過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加快在金融、貿易物流、專業服務及醫療健康等領域落地。當AI由一項技術逐步變成各行各業的生產工具，新的工作內容、技能需求和職位亦會隨之出現。因此，AI對就業的影響不能只看「少了多少工作」或「多了多少工作」。替代與創造同時發生，更重要的是新需求能否由現有人力順利承接。

結構：供求錯配更突出

相比職位總量，更值得關注的是就業結構的變化。香港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顯示，到2028年香港整體仍

短缺約13萬人；但另一方面，文書支援人員預計會出現約2.5萬至3萬人的力過剩。未來人力缺口主要集中在熟練技術人員，以及服務和銷售人員，兩者合計佔整體缺口約六成。這反映香港正面對勞動力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的結構性錯配：總量上缺人，部分職類卻出現力過剩。

更重要的是，宏觀上「缺人」，並不代表失去原有崗位的人可以立即填補缺口。技能、經驗和行業門檻都會影響轉換，就業轉型本身亦需要時間。如果供求錯配持續，一邊可能是勞工找不到合適出路，另一邊卻是企業「有職無人」。

香港「一五規劃」已從監測、培訓和配對三方面作出部署：透過人力推算和跟進調查動態掌握人力供求；建立「技能為本」的持續職業培訓系統，更早掌握和回應行業技能需求；並利用AI強化就業配對和資訊推送，提供更個人化的職位及培訓建議。這些部署反映，政策除了補充人力，也更加重視技能提升和供需匹配。

青年起步 中年轉型

就業結構的變化，最終會落到每一個人身上，其中青年和部分中年僱員承受的轉型壓力尤其值得關注。最新人力推算顯示，適合應屆畢業生的職位空缺較2022年銳減約六成；同時，全港約有7萬名45至54歲、未持有大專學歷的中年文書支援人員面對轉型壓力。

對青年而言，如果部分傳統入門職

位減少，問題不只是「找不到工作」，更在於如何取得第一段工作經驗、累積專業判斷和職場能力。香港「一五規劃」已提出監察科技應用對青年就業市場的影響，並協助青年尤其新畢業生取得在職培訓和工作經驗。

對中年僱員而言，關鍵則不是人人重新學習編程，而是如何把多年累積的行業經驗與AI結合，轉化為新的競爭力。香港「一五規劃」把中高齡人士列為就業服務的重點支援群體，並加強持續職業技能培訓；2026年施政報告亦提出為期18個月的AI技能提升計劃，預計惠及至少4萬名僱員。如果技能提升跟不上技術轉型，AI不但可能擴大技能差距，更可能形成新的「數字鴻溝」，令部分勞工在新一輪職場轉型中掉隊。青年要有第一站，中年亦要有轉身路。

以人為本共享發展紅利

香港「一五規劃」已在產業發展、技能提升和就業服務之間搭起基本框架，《意見》亦提出將「投資於物」與「投資於人」相結合。對香港而言，下一步的關鍵是將現有政策進一步細化至具體行業、崗位和工作任務，更精準掌握技能需求變化，打通教育、人才培訓、和職業轉型各個環節，降低勞工轉型成本，讓AI帶來的新需求更快轉化為實際就業機會。

教育方面，可探索建立「行業AI人才能力標準」。由院校、專業團體和企業共同研究醫療、金融、會計、工程

等不同領域所需的AI能力，並與課程、實習和持續培訓銜接，讓人才培養更貼近市場需要。

就業服務方面，可建立更細化的「AI就業轉型地圖」。不只分析哪些職業受到影響，更進一步細化至具體工作任務，連接職位空缺、技能需求、培訓和轉崗方向，讓勞動力供求變化更透明，也讓市民更清楚知道需要提升什麼能力、未來可以往哪裏轉。

大灣區方面，可探索建立「跨城AI產業實訓計劃」。不同於一般參訪或短期實習，可由香港院校與大灣區企業共同設計真實產業項目，讓青年跨城市、跨企業參與AI、機器人、生命健康和智能製造等項目的研發、測試和應用，並將實訓成果與學分、技能認證及企業招聘銜接。

AI浪潮不會停下來。從總量看，要兼顧替代與創造；從結構看，要改善供給與需求的匹配；落到個人，則要讓青年有起步、中年有轉型。真正重要的，不只是AI可以為企業節省多少成本、提高多少效率，而是技術進步能否同步創造新的工作機會、提升勞動技能，並讓不同群體都能參與其中。

當人才供給、產業需求和就業結構能夠隨技術進步同步調整，AI帶來的效率提升才不只反映在企業和經濟數字上，也能體現在市民擁有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技能和更多發展機會。只有這樣，生產力紅利才能真正轉化為就業紅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淬煉優質民主 築牢長治久安之基



葉建明

議論風生

2026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選舉事務處共接獲1155份提名表格，在36個經選舉產生委員的界別分組中，高達31個超額報名，八成多界別將通過差額選舉決定席位。這份答卷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打破了某種對香港新選舉制度的偏見，生動展現了社會各界踐行「愛國者治港」的熱情。這是一次對香港特色優質民主的深刻淬煉，它歷史性地揭示：新選舉制度正在轉化為特區的高效能治理，演化為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制度自覺。

全面理解本次選舉的新氣象，必須首先深刻體認選委會體制在特區管治架構中的特殊價值與根本意義。

選委會絕非一個簡單的選舉機構，而是香港政治生態的「壓艙石」。其特殊價值在於「承上啟下」與「全息代表」。它一頭連結着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一頭兼顧着特區的各階層利益，是落實「愛國者治港」的第一道也是最關

鍵的安全防線。

重新回歸「比賢競能」本位

過去的選舉架構容易滋生民粹與碎片化，而新選委會制度打破了地域與界別的狹隘藩籬。選委會不僅要選出特首，還要提名並選舉產生部分立法會議員，這在客觀上構建了一種「以行政為主導、行政立法良性互動」的全新架構。這意味着，選委會是香港從「內耗政治」轉向「效能政治」、從「對抗民主」轉向「協商善治」的制度樞紐。它的成功運作，直接決定特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成敗。

透視本次選委會選舉的提名盛況，最直觀的新氣象在於選舉文化的根本性顛覆。這是一場去偽存真、正本清源的「範式轉移」。

過去，在反中亂港勢力的刻意操弄下，香港選舉一度陷入泛政治化怪圈，政治表演態掩蓋了專業務實。而如今，新選舉制度如清流潺潺，讓選舉重新回歸「比賢競能」的本位。

八成多界別實行差額競逐，意味着

競爭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更趨激烈。但這種競爭告別了過去「只看立場」的政治口水戰，轉向圍繞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對接國家戰略等建設性議題的「真刀真槍」比拼。參選人比的是專業含金量，拼的是社會貢獻度。而愛國愛港成為共同底色。這種選舉文化的重塑，標誌着香港已徹底走出政治陰霾，政治生態實現了歷史性轉折。

選委會的主體結構決定了未來施政的價值取向。本次提名展現出的人群圖像是，對「廣泛代表性」與「均衡參與度」的最好詮釋。

新選舉制度將選委會界別由四個擴大至五個，人數由1200人增至1500人。這不僅是數量的疊加，更是民主結構的優化迭代。一方面，它締造了前所未有的「全景式」代表性格局。參選人中既有商界巨擘、行業翹楚，也有扎根社區的基層骨幹、青年才俊；既有傳統產業的堅守者，更有創科等新興領域的破局者。這種「全覆蓋」的利益代表機制，有效打破了西方代議民主極易陷入的兩極化弊端。

另一方面，超額報名的火熱態勢證明，新制度絕非「清一色」，而是名副其實的「五光十色」。不同的利益訴求、多元的專業視角，在愛國愛港的宏大框架下同台激盪。這種均衡參與，既保護了界別的特殊利益，更提煉了社會的整體長遠利益，從根本上調和了資本利益、社會利益與階層利益的衝突，為破解香港積年已久的深層次矛盾構築了最堅實的共識底座。

民主不是裝飾品，而是要解決市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香港正面臨產業轉型關鍵期、高質量發展攻堅期，土地房屋、貧富差距等結構性痼疾仍待破題。

啓動「善治」的關鍵鑰匙

在這一關鍵歷史節點上，一場高質量的選委會選舉，正是香港啟動「善治」的關鍵鑰匙。絕大部分界別差額競逐，意味着最終脫穎而出的1500名選委，必是歷經大浪淘沙、兼具真才實學、深得業界和市民信任的各界翹楚。

同時，本次提名湧現出大批年富力強、深諳國情民意的中青年專業精英，昭示着香港愛國愛港管治力量正在經歷一場健康的良性傳承與新老交替。這支高素質的選委隊伍，將在未來的選舉中，以國家整體利益和香港根本福祉為最高依歸，選出德才兼備的管治團隊。這將極大地將政治能量轉化為發展動能，確保特區政府能夠集中精力聚焦發展，高效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鞏固並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獨特地位。

2026年選委會選舉提名期圓滿結束，是香港新選舉制度展現強大生命力與巨大優越性的又一里程碑。歷史將證明，符合香港實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特區繁榮穩定的民主，才是高質量的優質民主。接下來展現新氣象、新文化的選委會選舉，必將凝聚起香江同心築夢的磅礴力量。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副理事長